

#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论证：哈贝马斯出于反对实证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目的，考察了从康德到黑格尔以至马克思的认识批判，认为这一“实证主义的史前史”蕴涵着危机；实证主义的正式确立则是危机的大揭示。在反思三者认识批判各自的得失和相互纠葛的过程中重构认识批判，从而对危机作出回应，以达其目的；这是哈贝马斯的策略。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关于“认识批判”及其“危机”观念的预先说明。这一章作为必须首先交待的背景知识和必不可少的前期内容，集中阐明了哈贝马斯认识论的基本立场、主要目的和大体思路（草纲），以及认识批判的“危机”之由来和内涵、解决危机的出路（途径和方法）。

第二章、对认识批判的危机史的具体考察。这一章全面展示了哈贝马斯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批判的反思历程，也即他对三者认识批判各自的得失和相互纠葛的解读和剖析，从而为重构认识批判准备了有益资源和必要素材。

第三章、对认识批判的危机的最终回应。这一章着重论述了哈贝马斯如何将认识与兴趣统一起来，提出了新认识批判；如何在将认识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的同时反对了实证主义；从而，回应了危机，达到了主要目的。

关键词：哈贝马斯；认识批判；社会批判；危机；重构

# 目录

导言.....	(1)
第一章 关于“认识批判”及其“危机”观念的预先说明.....	(2)
第一节 认识批判(反实证主义)与社会批判.....	
第二节 认识批判的危机和出路的指明.....	
第二章 对认识批判的危机史的具体考察.....	
第一节 反思康德的认识批判以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	
第二节 反思马克思的认识批判.....	
第三章 对认识批判的危机的最终回应.....	
第一节 新认识批判.....	
第一节 五个论点及其它.....	
参考文献.....	

## 导 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认识与兴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一书是其唯一的一部认识论专著。该书通过批判—反思的方法，在历史性考察的过程中统一了认识与兴趣，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同时，将认识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从而驳斥了实证主义，抨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书中对科学技术的功能、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语言沟通和共识等方面论述深广。而当前，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它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如何？资本主义社会许多领域正发生着或显或微的变化，其走向如何？全球交往网络日趋成形，其中的冲突如何消除？……这些时代课题迫切要求我们不断地展开广泛的探讨和研究，作出正确的回答。所以说，哈贝马斯的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思想材料，有待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利用。

但笔者注意到，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往往聚焦于哈贝马斯成熟时期的著作，如《交往行动理论》等，而对其早期的著作，如《认识与兴趣》等却研究不够；可这正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创作和思想脉络的重要源头之一，这正是我们内在地把握哈贝马斯关于上述时代课题的观点的前站。因此，伴随着国内学术界哈贝马斯研究的日益稳健和深入，有必要逐步对其思想理论作历史性的梳理，有必要回溯到他的早期著作或思想上加以考察，其中就包括《认识与兴趣》。基于此认识，笔者以该书第一章“认识批判的危机”为主干，结合其它章节，对哈贝马斯的考察与回应作一粗略的介绍和阐发。希望本文能对国内学术界哈贝马斯研究，特别是对其认识论领域的研究有所增进，也希望能对我们更深刻地关注、理解和塑造社会生活图景有所裨益。

## 第一章 关于“认识批判”及其“危机”观念的预先说明

哈贝马斯认识论的基本立场是什么？为何持此立场？目的又何在？再进一步提问，他坚持此基本立场、达到其目的的大体思路（草纲）是什么？以及，哈贝马斯为何认为认识批判存在着危机？出路（途径和方法）何在？……这些必须首先交待的背景知识构成了本文必不可少的前期内容，以下即作预先说明。

### 第一节 认识批判（反实证主义）与社会批判

哈贝马斯指出，彻底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导言》P1；P307）<sup>\*1</sup>这是哈贝马斯认识论的基本立场。此立场表明，他是以“批判的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 kritik）”来展开对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着意奠定公共论辩的理论依据；同时，认识批判通过对认识条件的研究，使以批判为手段的社会理论获得一个规范的基础并为其辩护。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是其认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认识批判则是支撑其社会理论的知识学构架，二者是互动的和互为条件的关系。

之所以持此立场，一来，乃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考量：无论是认识论还是社会理论，离开了社会历史的联系和对日常生活的观照，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们是认识论和社会理论的河床和基底；惟有通过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并且立足于日常生活，才可能沟通认识论和社会理论，即，一方面，从认识论上充分把握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再现认识能力的认识论尝试，具有假说的形式，这些假说可以通过它们被用来作为社会进化论的构思手段而间接地受到检验。……关于在有限条件下形成的人类（人类压根儿应当占有先验意识的逻辑地位）的陈述，最终只有在类历史或者社会进化论的框架

---

\*凡正文中出现之页码皆属哈贝马斯所著《认识与兴趣》一书，李黎 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其余见脚注。

内才能得到论证。因为人类学总是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人类]行为特征的经验概括太弱，而关于人的本质的本体论陈述太强。”（P308）

二来，更是在深受“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状况和实证主义的刺激之后作出的实践诉求。这是问题的源头和枢纽，也是其理论考量的蓝本。

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演进到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状况：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强；第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sup>②</sup>。前者破坏了古典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平交换、竞争等原则，使自由和民主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作为“补偿”，国家通过后者为广大居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福利以及消费和享乐，使他们在物质财富高度丰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非政治化起来，“自我物化”。国家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社会系统上应用科学技术的程式化、计量化等特性，使自身运作“优质”、“高效”，涂抹上“客观”、“公正”的色彩。如此这般，国家就获得群众的忠诚和认同，晚期资本主义就具备合法性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充当了新的隐形的意识形态的角色。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渗透和充斥着经济、政治和文化诸社会系统，成为一种宰制和扭曲的力量，这种现象，在学理上可以概括为“技术统治论”。哈贝马斯认为，新意识形态较之旧意识形态（神学、天国）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阻挠人们讨论社会基本问题的同时，不但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而且对另一个阶级而言，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兴趣本身。所以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实质上是虚假的、脆弱的和危险的：①它暗示着大面积的、深重的肯定性思维和顺从主义，造成了一体化的社会、单向度的人，意味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彼此间的分离和疏远；②一旦人们提出的愿望不能用与诸社会系统相一致的补偿来加以满足，就会产生合法性的危机；③科学技术被无反思地树立为科学主义之“新偶像”，隐含着统治的非理性之灾害，如热核战争、科技伦理等。因此，对病态的晚期资本主

---

<sup>②</sup>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 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8 页。

义社会进行批判是人类和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走向自由和解放，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步骤。对此，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病的痼疾正在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已被“国家”、“系统”塑造成为一个无限制地侵蚀生活世界的殖民者，从而嬗变出“科学化的政治和公共领域”。而科学技术的滥觞，一方面是其自身性质、方法论等特征在生产、生活、国家运作和社会系统中强力演示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得益于认识论上实证主义之推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之“功”尤甚，“技术和科学本身以普通的实证论思想的形式——表现为技术统治的意识”。<sup>①</sup>

在探究和拔除社会病变的根源这个关节点上，哈贝马斯确乎把目光锁定在认识论上。（《致中国读者》P2）在他眼里，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的代名词，它在哲学上对科学进行科学主义的理解和论证，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彼此关联的内涵：第一，科学唯一论，即把数学和自然科学与知识等同看待，认为科学是唯一可能正确的知识形式；第二，客观主义，即否认知识的主体因素和价值吁求，认为它的客观真理性不容置疑；第三，工具理性，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即单纯追求形式化、数量化和程序化的范畴体系，理性的工具模式淹没了理性的批判特质和反思本性，对效益的追求吞噬了对自由的追求，手段取代了目的。根据这个分析，哈贝马斯认为，当实证主义使科学的威信得到极度的张扬，几乎成为一种新的宗教的时候，就会消除人们对科学以及一切以科学面目出现的东西的反思和批判，而实际上，科学又恰恰被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诸社会系统所吸纳和利用，于是成为统治政权同化整个市民社会，证明其合法性和永恒性的权杖，最终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科技专制”局面；这样看来，实证主义无疑已把理论的思考变成了为工业社会的制度效劳的卑贱奴仆。

基于上述缘由，哈贝马斯认为，在认识论上进行实证主义批判是进行社会批判的前提和关键。他明确地说，反对实证主义是他创作《认识与兴趣》一书的切入点，以至最终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P305）

---

<sup>①</sup>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第73页。

哈贝马斯反对实证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思路是，通过批判——反思来进行理性重塑、科学技术——文化救赎和社会诊治工作；换言之，重构认识批判。关于哈贝马斯的工作思路，又先要作如下交代，也即他对实证主义基本原则的一般性否定和重构认识批判的草纲：

第一，关于知识形式。哈贝马斯指出，在实证主义之前，知识的图景并未为科学完全占据。尽管近代以来数学和自然科学往往被当作知识的范例，但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没有把知识等同于科学，哲学在那时也未丧失它作为一门独特的知识部门的地位，相反，哲学认识为科学争得了合法席位。在康德那里，这一点尤为明显。康德虽然也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当作科学的范例，但那只是他探讨可能认识的起点。他的先验哲学研究可能知识形成的条件和有效性的根据，为科学的合理性作辩护，从而不仅没有把知识等同于科学（知识还包括道德、艺术等），不仅没有取消哲学的作用，反而维护了认识批判在科学面前独立存在的权利和地位。

实证主义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知识图景。它要求“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为一种可能认识的形式，而是必须把认识与科学等同看待”，（P3）并且借助经验证实原则，把哲学判定为“形而上学”加以取消。但哈贝马斯认为，实证主义的科学唯一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科学只是可能知识的一种类型，在科学之外，还有历史——解释学和心理分析等理论。它们也包含着新信息和真理性，并启迪着人们的智慧。其次，科学只有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理解。实证主义把哲学驱逐出知识领域，把知识理论变成实证科学方法论，必然使人们对可能知识对象如何构成、科学符号组合规则何以产生等问题丧失认识能力，也必然使人们忽视主体的综合作用，最终必然导致知识——科学本身的意义得不到解释。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对人类和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功用，是必要的力量；其本身并不是生就的意识形态。社会病的症结也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国家、系统对它的操纵和无限制地推广。因此，应当对科学技术进行恰当的定位。

第二，关于客观主义。哈贝马斯认为，根本不可能在理论研究、知识探

索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主体的目的、爱好、情绪、需求、价值等主观因素、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人的理性本身也植根于它所形成的那个社会氛围之中；人的认识和科学知识的形成是一个由语言、劳动以及人的相互作用等众多因素交错综合的过程，因此，不能像实证主义那样“忘掉科学的方法论同人类的客观形成过程的错综复杂的联系”。（P3）况且，波普、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已经证明，“观察渗透着理论”，“证据受理论污染”。再上推至康德，他曾力图证明：知识是人造的，是主体思维形式作用于质料并经理性综合的结果。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应当在认识、知识和理论中索求到属于人的本位性要素。

第三，关于理性。哈贝马斯把理性作为哲学把握人类命运的唯一根本上有效的方式，作为社会病症的救治力量。他认为，理性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结构，工具理性并不等于理性一般，工具理性带来的“灾难”也不能全部推到理性身上，理性本身并无过错；即使是工具理性，也有其存在的特定领域和价值，关键是要防止它的僭越和泛滥。哈贝马斯还指出，理性本来表征着启蒙，标志着自由，而理性活动中演绎出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分裂）和背反，主要是人类理解有误、运用失当所致，特别是实证主义，错误地要求把工具理性推广到一切领域；因此理性需要作自我批判，用自身所包含着的解放潜能（反思）来克服理性的蜕变。此时的哈贝马斯还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所提出的理性异化论和系统论的痕迹，但也批判主体—客体二元化对立统一的理论模式，而他进步于前辈的地方在于，试图以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的基本概念，寻求某种交流合理性（die 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即期望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性沟通行动，不断克服理性工具化态势以及社会系统与同生活的分离，使人的认知和其它理论活动直接地同多种多样的人类生活联结在一起，实现社会的和谐和解放。

那么，如何具体划分知识形式，获得一种新的知识构架呢？如何具体消解客观主义的假象，明晰知识的主体因素和价值吁求呢？或者更根本地追问，如何具体推进批判—反思，获得一种新的理性形态呢？正是在这里，哈贝马斯凸显了批判—反思方法和历史情境，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脉络。



## 第二节 认识批判的危机和出路的指明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唯一任务和功能就在于“批判”，“在科学中，哲学是作为批判被保留的”，“除了批判之外，哲学没有任何权利”。（P56）他在这里说的哲学，指的就是认识论（包括方法论）。因此他把他所推崇和强调的批判的哲学（认识论）称之为“认识批判（die Erkenntniskritik）”。哈贝马斯进而指出，“反思的要素是批判的特征”，（P41）它与批判是内在一致的。明确地讲，在他那里，反思要素成为一个哲学理论是否具备认识论（认识批判）品格的标尺。对此，哈贝马斯在历史情境中作了阐明。

众所周知，在哲学史上，康德第一次将“批判”全面地变成为方法、理性的某种一般能力、哲学的构成因素以及哲学体系，并由此创立了“批判主义”哲学，据此，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康德哲学首先作“认识的批判（die Kritik der Erkenntnis）”，进行先验的反思，认识论才意识到自身独具的价值和震撼力之所在，从而进入它所特有的维度：理性批判；所以，康德哲学是认识批判史上的端点。在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都从新的角度和观点，在批判康德的批判活动的基础上，开展新的理性批判活动，企图使批判进一步得到提升并揭示人的理性本质；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发轫于康德的批判路线和反思精神发挥得几近极致，从而成为认识批判史上难以企及的高峰。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大大推进了黑格尔的自我反思进程，开辟了对认识主体进行反思的新道路：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劳动、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生产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革命实践。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以往批判活动的观念性和理念性，赋予批判活动以革命的和历史的现实意义，同时高度肯定作为批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批判活动本身对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环境的制约性和依赖性。哈贝马斯认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直至马克思的批判—反思历程，尽管理论原则和形态大有不同，并且一再失足，最终都流于破产，但都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推进批判—反思活动，诊疗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论资源。

哈贝马斯紧接着考察了实证主义，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缺乏批判功能和反思内核的哲学理论，对科学顶礼膜拜，因此，它不配称“认识批判”，不

是他所理解的认识论，而仅仅是单纯的“知识学”；哈贝马斯不无愤慨地指出，“我们否认反思，就是实证主义”。（《导言》P1）事实上，“认识论并不把自己限制在解释经验科学的认识上，不是把自己变成知识学”。（P1）所以，在哈贝马斯眼里，实证主义是哲学史上抛弃反思的极端化形象，至此，认识批判也宣告终结了。因而，他就以实证主义为分水岭，把“实证主义的史前史，”即在实证主义之前的从康德到黑格尔而止于马克思的批判—反思理性的历史，判定为“认识批判史”。按哈贝马斯的理解，反思是认识批判的核心要素，它构成了认识批判的方法论灵魂。一旦这样看待批判—反思和认识论的关系，就可以洞透哈贝马斯所宣称的认识批判的危机，包含着批判—反思方法论的危机。

如上所述，在哈贝马斯看来，实证主义正式登场之时，便意味着认识批判危机的总爆发。此前，危机则处于潜伏状态，表现为认识批判诸理论形态的一再失足和实证主义的侵蚀、进攻，根源于理性内部的分裂和自我误用。

哈贝马斯认为，自康德哲学开启认识批判以来，认识批判诸理论又一直都是不完善的。首先，康德批判理论过于形式化和分工化，未能深入揭示批判活动本身所必然引起的各种内在矛盾和吊诡性及其对于批判活动展示过程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当康德把主体理性分为知、意、情三个方面，又把文化分为科学、道德、艺术的时候，这种形式和功能上的划分，哈贝马斯认为，既表明了康德对科学知识的谨慎限制、对理性的清醒检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预示着一种文化领域上的分化和断裂，不利于社会整合和人格完善。而且，康德未免将理性的批判活动过于纯粹化和绝对化，未免有将理性批判活动脱离于复杂的日常生活实际的致命弊病。总之反思，诚如黑格尔的看法，在康德那里并不彻底。紧随其后的黑格尔体察到了理性统一的要求，作了全面的现象学的反思，但他把理性发展成无限物，又是一个极度膨胀的理性神话，其理论的支撑点——“绝对”范畴恰恰表明：使自然、人和社会以及科学，包括哲学等一切在一个封闭的精神系统中统一起来的努力是一种思想迷乱。同一哲学包含着的批判要素突破不了自身的坚硬的思辨外壳的束缚，削弱了黑格尔批判康德的力量，也窒息了理性辩证法展示过程中所隐含着的活

生生的创造力量。最后，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发掘出黑格尔哲学中的批判要素，用现实的人、现实的劳动和工业生产对现实世界所作的反思有着现实的说服力，但哈贝马斯遗憾地认为，马克思只知道工具行为（instrumentale Aktivität），忽视交往行为（kommunikative Aktivität）；只知道用自然科学覆盖人的科学，忽视反思；其哲学把握不住自己的社会理论意旨，从而抛弃了人类必不可少的理性的其他合理方面。马克思的“劳动”范畴暴露出工具论的迹象，有导致否定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危险倾向；因此，马克思与前哲一样，并不能防止认识批判向实证主义退化。

其间，哈贝马斯还指出，“在康德之后，科学在哲学上并没有得到认真的理解。（P2）黑格尔言过其实地把认识同绝对知识等量齐观，一切科学都只不过是哲学的前形式，事实上罢黜了对科学的严肃反思，从而为实证主义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而马克思并没有形成人的科学的观念，且把批判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P56）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在哈贝马斯看来，实际上是“唯物主义的唯科学论”。（P56）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反思历程漏洞百出，认识批判危机四伏，是否该为反思—认识批判划上休止符？哈贝马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反思这种经验是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留下来的永恒遗产。其中，他特别推崇黑格尔的现象学的历史性反思模式，把它作为重构认识批判的方法论启示。在《致中国读者》中他开宗明义地表示：“（黑格尔的）这个（反思经验）模式，激励我去进行重新构建实证主义的科学理解的史前史的尝试，以至于能够在这条道路上对自己尚不明确的假想展开反思，进而形成社会批判理论的恰如其分的自我理解。这里涉及到给以批判为手段的社会学奠定基础 and 进行认识论的辩护问题”。（P2）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反思作为认识论上的批判武器，永远不会过时。

而且，哈贝马斯坚信，“传统的理论框架基本上能容纳我们要做的事情”，但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和重构，比如他就怀疑，“对于一个应该符合实际要求的社会理论来说，来自黑格尔的总体，真理和理论的概念是否是个过分沉重的负担”<sup>①</sup>。哈贝马斯认为要消除这类顾忌，就要“从方法论上阐明一种具

<sup>①</sup> [英]《新左翼评论》记者：《哈贝马斯谈哲学、社会历史及政治》，参见《国外社会科学（京）》1986年第2期第51页。

有双重反思意义的（从其产生的环境和应用方面都是反思的）理论”；<sup>③</sup>结果便是《认识与兴趣》一书。可以看出，《认识与兴趣》着意从现实社会状况出发，从当代文化的视角着眼，将内在的反思和批判深入到前理解的认识批判传统之中，进行去蔽工作，实现“双重反思”，重构出新的认识批判，使之“符合实际要求”。

然而，“遗产”或“传统”，作为过去的、僵死的东西，能否对其进行反思和重构？这一点，学术界存在着争论。哈贝马斯在1967年发表的《科学的逻辑》一书中肯定能够对传统本身展开反思和重构。他说，“历史地前定的东西的实在在反思中被接受时，并不是不受影响的，已经明了的成见的结构不再作为一个成见起作用……但反思并不是无所作为地在传下来的规范的事实性上消磨自己。它必须依从事实，但在回顾时它发展了一种反思的力量”<sup>④</sup>。哈贝马斯认为，理解离不开反思，没有反思的理解是独断的；而且，当通过反思这个中介去接近传统、阐发传统时，便在主体与传统、传统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视界交融的关系。这样看来，反思便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传统的可重构性，也决定着传统的现实效果。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自信地认为，（新）认识批判面临的任务，“就是让人们意味到被否定了的（然而哲学始终所需要的）反思本身……我认为，完成这个任务的一个途径，就是重写近代实证主义的史前史，假如这项工作能够使用回忆的分析的力量，去抵挡那个唯科学论扎根于其中的排挤（其他理论的）过程的话”。（P305）受黑格尔的启发，哈贝马斯强调，他自己是“仿照自我反思的形象”来撰写认识批判的危机史的，把“自我反思作为一种思想活动认真对待”。（P306）在哈贝马斯看来，一旦自我反思活动按其内设的价值目标，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将旧认识批判从其历史泥淖中解救出来，并加以清洗和扬弃，以至于重构认识批判的形式和内涵，那么，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即被暴露无遗。

## 第二章 对认识批判的危机史的具体考察

---

<sup>③</sup> 转引自张汝伦：《哲学释义学，还是意识形态批判？》，参见《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第3期第22页。

哈贝马斯为了吸收有益资源，为重构认识批判作准备，具体地考察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直到马克思的认识批判的危机史。在考察的过程中，他展示了三者认识批判各自的得失和相互纠葛；实际上，这也是哈贝马斯新的反思历程。

## 第一节 反思康德的认识批判以及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

康德时期，伴随着科学的巨大成就，科学模式在西方近代哲学中呈现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唯理论和经验论分别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借用方法论，并把两者作为解释世界的范本。哲学的这种科学主义趋向，首先遇到了康德哲学的挑战。

康德把“人是什么”作为其全部哲学的总问题，认为对人的存在与意义的关切是哲学的根本生命力之所在，所以，他从①我能知道什么；②我应当做什么；③我可以希望什么三个方面规划人，用“文化”塑造人，分别涉及到认识论、道德学和艺术等领域。以此思想原则为指导，康德反思了唯理论和经验论之间的纷争，要求在认识之前先审查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展开理性批判。从既定事实出发，反身自求的结果是把主体的理性能力分为三种：理论理性（知）、实践理性（意）和审美判断力（情），三者的功能和界限是明确的，不能超越。理论理性形成科学，对应于“现象世界”；实践理性支持道德，对应于“本体世界”；审美判断力关涉艺术，不具备特立独行的地位，而是联结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桥梁。于是，人所栖居的世界，呈现出各个领域间既分离又关联的系统性，导向人的完备性。更为著名的是，康德判定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道德高于科学、人是最高目的、自由是人类生活的圭臬，其价值论立意振聋发聩。

不难理解，康德认识批判以其人本主义底蕴，全面地提出了理性批判问题，并使理性具有透明性和特定的合理性，此种优越性对于正奋力反抗实证主义的哈贝马斯来说，不啻是一部启示录。就认识论而言，当康德试图证

明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主要是靠人的感性和知性形式去规整经验质料时，就已经显示出认识和知识的主体性或主观性特征；并且，由于康德设定人通过先天的感和知性形式充其量只能“知道什么”，获得知识，而不能明确“应当做什么”，这就显示出康德对实证主义式的把关于外部自然界的知识照搬于社会实践和人类的观念和行为的批评。哈贝马斯表示：“随着康德对可能的必要的主观条件的分析，创立了一种非客观主义的论证类型；任何作为认识论出现的知识学，在反思没有被随意中断的情况下，不应当忽视这种非客观主义的类型”，（P312）因此，在随后的重构认识批判的活动中，哈贝马斯把被实证主义狭隘化的科学概念重新泛化为包含着自然科学、人的科学和批判理论等知识部门在内的丰富性范畴，各知识部门“术业有专攻”。这样的科学概念充满着文化的内涵。很清楚，哈贝马斯“对不同的客体领域和与此相应的‘知识形式’所作的结构论的界定”（P303）明显地带有康德认识批判的性格。

哈贝马斯还回顾探讨了康德的“理性兴趣（Vernunftinteresse）”概念。（P201~P207）他认为，康德为了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而提出了理性兴趣概念。在康德那里，一方面，自由本质上是自律，并不取决于经验动机；但另一方面，自律的道德主体之所以会遵循道德法则、服从绝对命令，似乎有某种非经验的、纯粹对理性原则自身感兴趣的深层内驱力来催发并实现意志自由。康德把这种深层内驱力称为“纯粹的兴趣（reines Interesse）”，它是从道德情感中引申出来的。纯粹的兴趣只对行动本身及理性原则感兴趣，发自道德义务；而不同于“经验的兴趣（empirisches Interesse）”，后者对行动的对象和结果感兴趣，发自感官快乐。可见，只有纯粹的兴趣才是理性兴趣，经验的兴趣不是理性兴趣。在康德看来，理性当然不能受感性经验支配，而是相反：理性能够按照自己的原则影响感性、决定感性、产生纯粹的兴趣。至于作为纯粹的形式性的理性怎么会产生纯粹道德的兴趣（不管怎样，这还是某种动机或感觉），这是不可说的，是“一切实践哲学的极限”。

尽管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论述是矛盾的，但他注意到理性兴趣概念的主体属性及其对于认识和行动的基础地位，因此在后来的新认识批判中，“兴

趣 (Interesse)” 概念被改造成为认识论的阿基米德点。也就是说，哈贝马斯沉潜于心理深处，“用重建认识条件的方法批判地进行” (P336) 反实证主义工作，竭力从源始层面 (“兴趣”)，内在地摧毁科学主义迷信：兴趣是认识和行动的基本导向，在兴趣的引导下获得的认识成果就是科学知识，兴趣框架之构成与各知识部门分别对应；由于兴趣是属于主体的要素，兴趣又是支持认识形成和知识产生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它就暴露了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要求的虚假性，也昭示知识部门的多元性有着深层的主体根基。诚然，哈贝马斯的兴趣概念与康德的理性兴趣概念在内涵上大有不同，因为前者已被嵌入历史、文化、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之中，按哈贝马斯的说法，兴趣因与生活要素 (劳动和相互作用) 打成一片，属于 “准先验的坐标系 (quasitranszendentes Bezugssystem)”；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新认识批判中 “兴趣” 这个 “变换了形式的先验哲学概念的出现” 可追溯于此。这是反思认识批判史的又一积极成果。

同时，哈贝马斯又准确地指出，康德认识批判既有值得借鉴之处，也有应当规避的地方：康德认识批判的内在矛盾和吊诡性以及非历史性引起了黑格尔对它的批判，“康德的继承人不再把先验的条件 (范畴和直观形式) 以及在这些条件下进行综合活动的主体本身视为给定的，而是理解为生成的 (generiert)。” (P312) 哈贝马斯主要考察了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元批判。

一开始，黑格尔就质疑康德的在认识之前先考察认识的可能性条件边一要求，他认为这种貌似批判一切的提法是虚假的，与只是在岸上学游泳一样可笑；其实，只有在认识过程中才能考察认识的能力和范围，正如只有在水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

接着，黑格尔批判了康德认识批判赖以起步的三个前提：

第一，关于规范的科学概念。康德把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确定为可靠的认识，在此前提下，他采纳了数学和物理学中得到证实的原理，并从这些原理出发反推出我们认识能力的结构。就此而言，康德认识批判并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从批判一切固有的前提开始的，而是事先已悄悄地接受了 “规范的” 科学这一前提；这样看来，康德认识批判并非是纯粹的。何况，“当

时的”具体存在着的科学并非是一种确定的真理性知识的本质尺度，而只是“科学一般”发展链条中的一环，是相对性知识，有待在历史过程中显现、竞争和生长。（P12）

第二，关于规范自我概念。康德的“自我”是一种自明的自我意识、“成熟的认识主体”，拥有整套先天的规则系统（范畴和直观形式）这是科学客观有效性的最终根源。他宣称“我毫不怀疑就是这些，不多不少恰好这么多纯粹理智概念，足够纯粹理智构成我们对物的全部知识”，<sup>①</sup>这说明康德按照整个非历史的意识之同一性，用先验的必然性来保证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性。但是，<sup>②</sup>这些规则系统是从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中移植过来的，所以，当黑格尔动摇了认识批判的第一个前提时，也就冲击了其第二个前提的稳固性；<sup>③</sup>没有什么固定不变自我。自我意识只能内在于整个人类意识发展史之中，它的本性是运动和变化；主体在自我反思历程中认识自己、确定自己，在知识上打上主体的烙印。所以，始终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的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实质上，当康德在证明“人为自然立法”、主体规则系统构造知识的同时，也就驳斥了自己所作的证明知识客观性的努力。

第三，关于理性的区分。康德为了限制知识，以给信仰留下地盘，将理性劈分为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但是，既然规范的科学概念和自我概念成了问题，既然黑格尔已经以唯心主义方式显示了认识和实践行为在绝对精神系统和人类意识形态史中的连结，那么，康德把理性分开来考察的做法就很值得商榷。也就是说，理论理性不可能以抽象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和历史之中，它总是具有其现实的社会和历史规定性，它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我们不能把理论理性设定为遵循某一种目的原则，而将实践理性设定为遵循另一种目的原则。

简言之，黑格尔现象学的反思模式凭借其巨大的历史感和犀利的辩证法精神，暴露了康德认识批判的根本失误便是静态地勾画理论，将理论与社

---

<sup>①</sup>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9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